•中国民俗学会2025年年会论文•

**《搜神记》中龙形象的继承与重构**

**（上海大学文学院 叶源欣）**

**摘要：**龙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其形象演变折射出社会信仰与文化心理的变迁。《搜神记》中的龙可按职能划分为坐骑、征兆、象征、报恩四种类型，受原始神话遗存、民间信仰演变、谶纬之说盛行、文学自觉与审美意识、佛教传播及道教发展的影响，小说家创作出多样化的志怪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民间传说的记载，更是原始崇拜的延伸，体现了民间故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探讨以《搜神记》为代表的魏晋志怪小说对龙形象的继承与重构，有助于理解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及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

**关键词：**《搜神记》；龙形象；志怪

**一、引言**

龙作为原始信仰的产物，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龙的形象特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演变，在民间口传故事中不断衍生，在文学作品中被反复书写，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字最早可见于殷墟甲骨，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便指出“其字多异形”，且均为巨口长身、头有簇角的象形字。《说文》释“龙”字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文字记载中的龙形象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现存各类图像中龙的形象也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直到宋代董羽《画龙缉议》才对龙形象做出相对稳定的形象说明。[[1]](#footnote-0)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留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footnote-1)魏晋时期，鬼神思想大行其道，小说家在吸收《山海经》等典籍中所保留的神话素材，汲取民间流传的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大量志怪作品，《搜神记》便是其中代表。《搜神记》成书“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3]](#footnote-2)，所录故事兼有汉魏以来的典籍故事与晋代采访的故事，由此一书，我们可以窥得魏晋小说大致样态。袁珂先生认为《搜神记》中保留中国神话材料的丰富程度仅次于《山海经》，堪称第二。[[4]](#footnote-3)干宝《搜神记》原书三十卷已佚，今所能见的二十卷据考证是由明人自《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中辑录而成，虽偶有疏漏或讹误，但大致可以见出原书的本貌。

目前学界对于《搜神记》中龙形象的研究或注重龙形象的外在表征，梳理自先秦以来玉器、青铜器，汉代画像石乃至后世服饰、文人画中的龙形图像变化；或着眼于经史典籍中正统文学叙述中龙的象征意义，对民间故事中的龙关注不足。

研究内容也多侧重于宏观层面的龙形象文化内涵探讨，缺乏对龙形象具体特征、职能分类的剖析。分析《搜神记》中龙形象的特征、分类及其在故事中的功能与意义，可以为龙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二、《搜神记》龙形象的分类**

《搜神记》涉及龙形象的故事有十余条，主要集中于卷一及卷六。其中“龙”出现的形式可谓复杂多样，对于龙的称呼也不拘于“龙”及“龙首”“龙身”等形态描述，或按其颜色称为“黄龙”“赤龙”，或按其善恶称为“妖龙”，或按其幻化的形态称为“老叟”“童子”等。《搜神记》所录故事中的龙都拥有呼风唤雨、腾云飞天的能力，或报恩，或报仇，或征兆祸福，或作为坐骑，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整理《搜神记》中与龙相关的篇目，可以大致将其中的“龙”故事中的龙按照职能作出以下分类：

1. 坐骑型

《搜神记》中所载故事中龙的一个重要职能便是作为凡人升天的坐骑。《搜神记》卷一中记载了这样两则故事：其一是赵人琴高进入涿水，捕捉并骑乘“龙子”赤鲤；其二是陶安公因为冶炼之术通于上天，由朱雀报信，赤龙相迎，最后骑乘赤龙离去。第一个故事中的琴高“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5]](#footnote-4)，是一位修习神仙之术的得道之人，故而能够捕捉并骑乘龙子在情理之中。而后一则故事中的陶安公则仅仅是一位铸冶师，既非天上神仙，也非修道之仙人，竟也可以乘赤龙飞升，可谓奇事。

卷三中又记载了一则郭璞卜筮的故事，故事主干与龙无关，但却提及当时的一位县农曾经在怪事发生前看到了龙牵车的奇状：“五色晃烂，其大非常，有顷遂灭。[[6]](#footnote-5)”可见龙不仅可以作为坐骑直接骑乘，还可以作为拉车的工具，但此处并未对龙车进行进一步的描写，故而不知龙为何人牵车，但此龙车“五色萦绕”，行驶于空中，定然不是常人所乘。

1. 征兆型

魏晋时期，人们认为龙应处于名山大川当中，张华《博物志》卷一中有：“名山大川，空穴相纳，和气所处，则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龙灵龟行于穴中矣。[[7]](#footnote-6)”的说法。龙作为神异之兽，被认为是灾异祥瑞的象征，其出现必然伴随着时局的巨大变动。当龙处于正常状态时，它是吉祥的象征，处于非正常状态时则是灾异的象征。《搜神记》卷六与卷七中便出现了数篇龙出现于非正常场景中，并做出异于常规行为的故事：

鲁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其邑中也。”[[8]](#footnote-7)

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现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9]](#footnote-8)

太康五年正月，二龙见武库井中。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非龙所处。是后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窃神器，皆字曰“龙”[[10]](#footnote-9)。

前两则故事均用京房《易传》来解释妖龙出现对于时局变动的预示，后一则则简单以“非龙所处”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出现了大量人生龙故事，并将人生龙视为灾异的象征，这与此前出现的龙感生故事寓意截然相反，可以归纳为龙在非正常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类型。《搜神记》卷六中记载周烈王六年，林碧阳君的御人生下了两条龙，此篇虽未写明“人生龙”怪事发生的后续，但由史书可知，此时的周王室已经处于衰微的状态，天下倾覆危在旦夕。《搜神记》卷七又载：“永嘉五年，枹罕令严根婢，产一龙，一女，一鹅。”[[11]](#footnote-10)此篇也未写明后续，但是当年即发生永嘉之乱，四海沸腾，不久后，西晋灭亡，可谓时局震荡。

1. 报恩型

《搜神记》卷二十中记载了一则病龙报恩的故事：

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12]](#footnote-11)。

农夫向龙洞之中的龙求雨，但龙病受苦而不能自救，所下之雨腥臭污秽。在听闻孙登之言后，病龙化作老翁向农夫求助，并许诺如果能够得到治愈便会报答农夫，痊愈之后果然降雨穿井，感恩相报。同一卷中的另一则故事则相对复杂，同时包含了龙报恩和龙报仇两个情节：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 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13]](#footnote-12)

巨鱼形状的龙子因江水暴涨，被困三日而死，死去的龙子被郡人分而食之，招致了龙的报复。食用龙子的郡人皆随着城池陷入湖中死去，独独不愿食用龙子的老姥在龙另一个儿子的指引下逃出生天。可见时人想象中的龙善恩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1. 象征型

自秦汉以来，“龙”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人间的帝王借龙以彰显自己在地上的权威，龙一度成为帝王的代称和天命的象征。在一些故事中，虽然并无龙这一种传奇生物的出现，却使用龙作为特殊人物的象征。

《搜神记》卷四中，将秦始皇称为“祖龙”，这个称谓在《史记·始皇本纪》中便已经出现，裴骃集解道:“祖，始也；龙，人君像；谓始皇也。”可见，最迟至汉代，人们已经将“龙”与“人君”联系起来，借神话世界中受到先民崇拜的“龙”比附现实人间中至高无上的帝王。与此相似，《搜神记》卷六中将光武帝刘秀赞为“飞龙”：

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飞龙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祚，其名曰秀。[[14]](#footnote-13)

又如《搜神记》卷八中描绘帝舜的容貌为“龙颜”：“舜，龙颜大口，手握褒。[[15]](#footnote-14)”

此外，还有一些篇目中出现了以龙来命名的景物和人物，这些名称蕴含着吉祥、尊贵的寓意。如《搜神记》卷一中有：“师门者，啸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为孔甲龙师。”其中“龙师”的本意是以龙命名的百官师长，《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可见“龙”字所衍生的含义与地位相挂钩。此外还有云龙门、金龙池等，均是以“龙”来给门、水池命名。

由此上四条，我们可以总结出《搜神记》中不同职能龙的形象特征：作为坐骑的龙，是得道之人和凡人骑乘的工具；作为征兆的龙，预示时局的变动；作为神兽的龙，是履行因果业报的主体；作为象征的龙，是帝王权威和天命的具象化。

**三、《搜神记》中龙形象的成因**

《搜神记》内容涵盖神仙方术、鬼怪精魅、因果报应、祥瑞灾异等，所录故事兼有汉魏以来的典籍故事与近代采访的民间故事，其故事内容也受到众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原始神话遗存、民间信仰演变、谶纬之说盛行、文学自觉与审美意识的兴起，以及佛教传播与道教发展，共同影响了《搜神记》中龙形象的塑造。

1. 原始神话与民间信仰的影响

《搜神记》中的“龙”形象与原始神话中的“龙”形象并不相同，但循其变化之迹也不难见出不变之处。从龙的能力而言，无论志怪中的龙如何变化，他们始终没有脱离上通于天，下入于渊的基本特性，这个特性体现为两项超自然的能力，一是飞翔的能力，二是操控降水的能力。 对于龙的想象和书写接受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原始神话中的基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想象和演化。

在《山海经》所构建的神话世界中，龙能够腾云升天，故而成为神人和人间帝王的坐骑，或是神人拉车的神兽。上古传说中的四方之神均是乘两龙而行，人间帝王夏后启更是伴随着音乐与重重云彩，驾驭两龙出行。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16]](#footnote-15)

在《搜神记》描绘的世界中，龙也时常以坐骑的形式出现，只不过御龙者的范围从神或是人间帝王扩大到得道之人甚至普通的凡人。如《搜神记》中的琴高骑乘龙子、陶安公乘龙升天等。龙从受人祭祀与崇拜的神本身或是神坐骑，演化为可以为人所驾驭的神兽。

不同于《山海经》中保持着原始自然崇拜色彩的“龙”形象，汉代以来龙的形象发展得更为完备，在民间信仰中龙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致雨的神兽，云、雨、龙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17]](#footnote-16)龙与云雨降水的紧密联系映射于魏晋志怪小说当中，便产生了大量向龙求雨的故事，《搜神记》中龙洞求雨便是例证。《搜神后记》中又有《虬塘》篇：

武昌虬山有龙穴，居人每见虬飞翔出入。岁旱祷之，即雨。后人筑塘其下，曰“虬塘”。

不过求龙降雨的故事也并非魏晋小说家杜撰，早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便有记载关于“应龙求雨”的片段：“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注曰：“今之土龙本此。气应自然冥感，非人所能为也。”所谓“土龙”即是用土制作成的求雨道具，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详细记载了这种求雨仪式在数字、方位、颜色等方面遵循的五行配对原则，体现出汉代五行思想与“龙”文化的结合。而至东汉时期土龙求雨逐渐礼制化，成为国家雩祭的辅助礼仪[[18]](#footnote-17)。这种仪式流传至魏晋自然而然地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和志怪小说取材的对象。

除了此类提及求雨的故事，其他与龙相关的故事也与降水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龙报恩还是报仇，几乎都是通过操纵雨和水来完成。《搜神记》“古巢老姥”一则便是如此。可见《搜神记》在继承《山海经》中“应龙求雨”与汉代以来以龙求雨仪式的基础上，将“龙”与云、雨、降水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联结。

1. 谶纬之说的盛行

汉代以来信仰中心发生了转移，自然崇拜逐渐消解，宣扬“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的谶纬之说盛行，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谶纬的观念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天人感应”观念影响下皇帝代表天，而龙也由《山海经》等典籍所载神话中受到先民崇拜的“神”，逐渐成为君权天命的象征。与此同时，发端于原始先民自然崇拜意识的祥瑞意识在两汉系统化，并成为一种理论体系，至魏晋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19]](#footnote-18)记载有大量“祯祥变怪”的《山海经》自然成为《瑞应图》之类图的取材对象，“龙”形象也逐渐衍生成为祥瑞灾异的征兆。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便指出：“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卜祯祥之所隐。[[20]](#footnote-19)”正如《春秋感精符》所云：“帝王之兴，多从符瑞。”祥瑞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体现在志怪中，如《搜神记》卷七中所记开石文字，便兼有祥瑞天命、阴阳五行、五德始终的观念，以“龙”的形象作为祥瑞征兆的象征，以揭示汉末魏晋乱世之中政权更替演变的规律：

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案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帻，执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之”。 [[21]](#footnote-20)

1. 原始崇拜的消解与人性自觉

魏晋以来，志怪小说中具有“龙”形体特征的神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以本体出现的龙。龙逐渐由神本身演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兽，原始崇拜逐渐消解。

《山海经》中的龙，兼有神性和兽性，作为原始图腾，体现出先民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意识，对于龙的崇拜也既是对于自然力的崇拜，对于龙的畏惧也体现出对于自然力的畏惧。而至《搜神记》，不难看出龙上古时所具备的凌驾于“人力”之上的“神力”逐渐淡化，龙甚至开始为“人力”所束缚。自上古以来有大量的龙感生故事，龙附于人而使人有孕，体现出人对于龙所具有的神力的向往。而《搜神记》中出现的两则人生龙故事则与之相反，人将龙视作为“异物”，并不再认为龙是具有“神力”与“神性”的神。京房《易传》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皆为天下大兵。”[[22]](#footnote-21)魏晋志怪中将龙与鹅、狗等“他物”并举，将“人生龙”与“人生狗”“人生鹅”等视作为同类现象，可见对于龙的神性信仰的淡化和消解。龙与人的关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人力与神力，也就是人力与自然力的较量与消长。

除了“神性”与“兽性”之外，魏晋小说中的龙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人性”化特征。《搜神记》中的龙病而不能自医，不得不求助于人代为医治，可见时人想象中的龙并非全知全能，其降雨的能力也会受制于疾病等外力，与凡人别无二致。人可以为龙医治，这也体现出人对于人性与人力量的自信。这在魏晋时期的其他志怪中也有所体现，如《异苑》卷三中 “土龙哭姥”的故事，则体现出龙被赋予了人的感情：

晋义熙中，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居室内地忽自隆起，姥察为异，朝夕以酒酹之。尝有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有声如哭。后人掘地，见一异物，蠢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23]](#footnote-22)

1. 佛道思想的影响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土，在佛教思想观的影响下魏晋以来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动物报恩、杀生恶报类志怪，直观地展示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观[[24]](#footnote-23)。龙作为神兽，自然也被运用于因果业报故事当中，人有恩于龙，则会受到龙的报答，反之则会遭到龙的报复。龙虽为神兽，但是此篇目中龙报恩与常见动物报恩这类志怪的情节大体一致：先交代动物受难，然后人布施渡过难关，最后动物感恩相报。[[25]](#footnote-24)

随着道教神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人们幻想能够如神人一般升天入地，而凡人想要进入缥缈的神仙世界，又不得不借助于外力。

道教之人追求长生，希望通过修炼得道进入神仙世界，与神人一同出行于天地之间。龙能够腾云升天的特性与道教思想中的御风而行、修炼成仙等观念紧密贴合。在上古神话中作为神坐骑出现的龙自然也拥有了沟通天地的作用，被塑造为凡人通往神仙之所的工具，接引得道之人前往神仙世界。龙开始频频出现于魏晋以来的道教色彩浓厚的小说中，例如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中所写的壶公便骑乘青龙所化的竹杖往来于天地之间。《抱朴子》中的《须曼卿》一篇，更是描绘了凡人乘龙升天的情景与感受：

蒲坂有须曼卿者曰：“在山中王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乘龙升天。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26]](#footnote-25)

《搜神记》中的龙形象在继承先秦神话龙形象的基础上重构发展，通过赋予龙更为具体的职能，丰富了龙在文学书写中的形象，为后世文学尤其是唐传奇与明清小说中的龙形象塑造提供了重要范式。

**四、结语**

在魏晋时期，中国志怪小说迎来了其发展的高峰，原始神话的遗留、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之说、佛教的传入以及道教的成熟都对志怪小说的书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魏晋时期的小说家们在继承既有神话材料中“龙”形象的基本特性的同时，也融入了时代特征和时人思维，对“龙”形象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建构，创作出更为多样丰富的志怪故事。

早期的志怪小说不仅是对民间传说的简单记载，更是原始崇拜在后世的延伸。这些故事在传承中不断演变，体现了民间故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魏晋以来的志怪故事对龙形象的继承与重构，揭示了民间故事在时代变迁中的动态变化。借此，我们也得以窥见先民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想象，洞悉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与演化。

1. 施爱东;刘丹一《中国龙形象的历史演变》，《美术》2024年第7卷。 [↑](#footnote-ref-0)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footnote-ref-1)
3.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版，第2页。 [↑](#footnote-ref-2)
4. 袁珂著《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版，第180页。 [↑](#footnote-ref-3)
5. 《搜神记》第5页。 [↑](#footnote-ref-4)
6. 《搜神记》第38页。 [↑](#footnote-ref-5)
7. 张华著，李石撰《博物志 续博物志》，中国书店2019版。 [↑](#footnote-ref-6)
8. 《搜神记》第71页。 [↑](#footnote-ref-7)
9. 《搜神记》第72页。 [↑](#footnote-ref-8)
10. 《搜神记》第94页。 [↑](#footnote-ref-9)
11. 《搜神记》第102页。 [↑](#footnote-ref-10)
12. 《搜神记》第237页。 [↑](#footnote-ref-11)
13. 《搜神记》第239页。 [↑](#footnote-ref-12)
14. 《搜神记》第84页。 [↑](#footnote-ref-13)
15. 《搜神记》第110页。 [↑](#footnote-ref-14)
16. 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 [↑](#footnote-ref-15)
17. 徐金龙，王梓薇，刘中兴《以龙求雨:从传说、巫术到习俗》，《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 [↑](#footnote-ref-16)
18. 张强《中国以龙求雨习俗变迁研究》，湘潭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footnote-ref-17)
19. 王静文《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中的祥瑞研究》，辽宁大学2023年博士论文。 [↑](#footnote-ref-18)
20. 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footnote-ref-19)
21. 《搜神记》第93页。 [↑](#footnote-ref-20)
22. 《搜神记》第102页。 [↑](#footnote-ref-21)
23. 刘敬叔《异苑》，中华书局1991年版。 [↑](#footnote-ref-22)
24. 冷艳《魏晋南北朝佛教与志怪小说研究》，吉林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 [↑](#footnote-ref-23)
25. 冷艳《魏晋南北朝佛教与志怪小说研究》，吉林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 [↑](#footnote-ref-24)
26. 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89页。 [↑](#footnote-ref-25)